

#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 梦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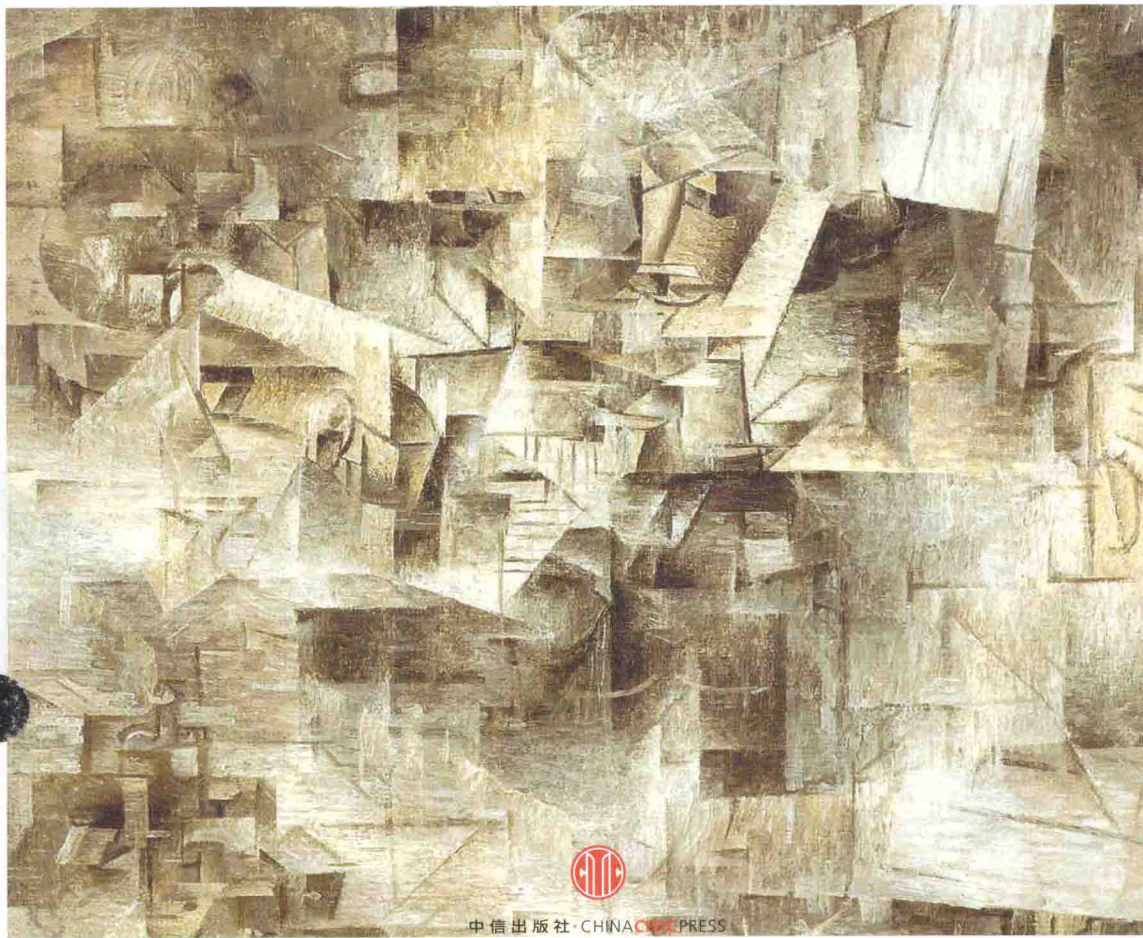
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Christopher Clark) ◎

董莹 肖潇 ◎

沃尔夫森历史奖得主倾力之作

坎迪尔历史奖、《纽约时报》2013年十大好书、《洛杉矶时报》图书奖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014058642

K143  
26

#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梦游者

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Christopher Clark) 著  
董莹 肖潇 译



K143  
26



北航

C1745022

015028845

The

Sleepwalker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游者: 1914年, 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 克拉克著; 董莹, 肖潇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4.9

书名原文: The Sleepwalkers

ISBN 978-7-5086-4699-2

I. 梦… II. ①克… ②董… ③肖… III. 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料 IV. K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5959号

The Sleepwalkers by Christopher Clark

Copyright © 2012 by Christopher Clark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梦游者: 1914年, 欧洲如何走向“一战”

著者: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

译者: 董莹 肖潇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9.5 字数: 545千字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3-6741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4699-2/K·402

定价: 69.0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1914年的这些主角们就是一群梦游者，他们悬着一颗心，但又视而不见，他们被自己的梦困扰着，却没有一个人睁眼去看看，他们将带给这个世界的是一场怎样的灾难。

——本书作者

献给约瑟夫和亚历山大







## 推荐序

丘吉尔说，“一战”史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一战”的开始，因为谁都不知道“一战”是怎么开始的。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自1914年8月至今，大家从未停止讨论‘一战’的起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用掉的墨水、所制造的纸张、所牺牲的树木以及为此忙碌的打字机，比回答历史上任何其他问题所用的都多。”

传统观点是，德国蓄意发动了“一战”。这一观点在“二战”之后非常流行，主要代表作是弗里茨·费希尔（Fritz Fisher）在1968年出版的《“一战”中的德国目标》（*German'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但后来的历史学家大多倾向于认为德国确实最轻率鲁莽，但谈不上有事先周密的计划。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是最近两年关于“一战”最畅销的作品之一，他的观点是“‘一战’的爆发是一场悲剧，但不是一桩罪行”。

“一战”的导火线是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但克拉克认为巴尔干的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903年6月11日，28个塞尔维亚军官闯进了贝尔格莱德的皇宫，亚历山大一世国王和德拉加王后被乱枪击毙，两人的尸体被叛军刀砍斧剁，然后从窗户抛下花园。这场血腥谋杀结束了自塞尔维亚独立后一直统治国家的奥布雷诺维奇王朝。新的国王佩塔尔一世在哗变军官的拥戴下登基。自此之后，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势力大涨，策划刺杀亚历山大一世的军官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 后来成了塞尔维亚的军事情报部门主管。他是一个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组织了一个地下组织，叫“统一或死亡会”(外界则称之为“黑手会”)。在贝尔格莱德的咖啡馆，热血青年们可以公然讨论暗杀、动乱的计划。枪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凶手普林西普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普林西普和其他两位恐怖分子都是从塞尔维亚偷渡到波斯尼亚的，他们的手枪和炸弹也是塞尔维亚军方提供的。

当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的消息传到维也纳，人们感到的是惊愕，而不是悲痛。没有人喜欢傲慢无礼的斐迪南大公，但奥匈帝国的鹰派人物认为这正是一个报复塞尔维亚的绝好借口。奥匈帝国的鹰派之所以如此蛮横，不是因为他们强大，恰恰相反，是因为奥匈帝国已经江河日下。正如自卑的人自尊心格外强一样，奥匈帝国对国家的尊严也更为敏感。鹰派认为，如果不利用萨拉热窝事件大做文章，挫败塞尔维亚对外扩张的野心，一劳永逸地解决令人头疼的巴尔干问题，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奥匈帝国的国内政治局势也需要一场对外战争。奥匈帝国有很多少数民族，各种分裂主义的声音越发响亮。战争，只有一场战争，才能像一剂强心针，把奥匈帝国从衰亡和分裂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奥匈帝国在筹划入侵塞尔维亚时，几乎没有考虑俄国出兵的可能性，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俄国是不会出兵援助的。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算。俄国一直把巴尔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人和巴尔干民族都属于斯拉夫民族。19世纪，泛斯拉夫主义在巴尔干地区逐渐流行，而俄国一直是其背后的支持者。尤其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原本觊觎的是中国东北，他幻想能够建立俄国的远东帝国。但日俄战争失败之后，俄国转而加紧经营巴尔干半岛。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无异于是到俄国的后院放火。俄国这次再也输不起了。而就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时，俄国已经秘密地开始集结部队。在巴尔干地区，奥匈帝国和俄国就像两辆迎面行驶的列车，终于相撞了。

如果德国不参战，那么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将引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但这也只是一场局部冲突。

德国统一之后，有“铁血宰相”之称的俾斯麦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为了遏制法国，德国和所有欧洲大国都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关系。德皇威廉一世去世之后，老臣俾斯麦失去了政治靠山。29岁的威廉二世继位。威廉二世性格暴烈，

对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充满鄙视。新人新政策，德国很快就提出了“世界政策”的主张。德国人说：“我们不想把任何人置于阴影之下，但是我们也要在阳光下有自己的位置。”但究竟什么是世界政策？没有人知道。在世界政策的外交道路上，德国越走越窄，最后几乎连一个朋友都找不到。

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势不两立，德国必须在这对冤家中选择一个。德国选择了奥匈帝国。对应地，俄国选择了法国。德国曾试图拉拢英国，但这两个国家的气场就是不对。英国有英国的傲慢，德国有德国的自负。1896年，英国在南非入侵德兰士瓦失利，威廉二世冒冒失失地发给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一封电报，表示祝贺，英国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另从19世纪90年代起，德国开始扩充海军，英国觉得这是一种挑战。1904年，英法正式签订协约，达成了关于海外殖民地的谅解。英德从此成陌路。

此前曾提到，过去主流认为，“一战”是德国预谋已久的计划。巴黎和谈的时候，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曾经讨论过，到底在哪里审判和绞死威廉二世。其实，直到最后一刻，威廉二世还在犹豫。他对主战的军官们说，我给了你们想要的，你们可不要后悔啊。“一战”结束之后，威廉二世流亡荷兰。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是犹太人和共济会阴谋发动了“一战”。

德国走向“一战”的真正原因是，这个后起之秀迫切地想要成为世界上说一不二的帝国，但一点儿也不知道该如何成为帝国。

如果英国不参战，那么德国的介入会引发一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战争，但这还称不上是世界大战。

英国最后选择和法国、俄国站在一边，怎么看都是一种奇怪的选择。英国和德国本来是天然的盟友，但和法国、俄国却是长期的对手。德国和英国都是君主国，德皇和英王还有亲戚关系。德国和英国都是新教国家，不像法国，是个无神论和天主教的国度，也不像俄罗斯，是个东正教的国度。法国和英国是宿敌：在英国称霸世界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就是法国。两个国家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打了100多年的仗。在争夺非洲殖民地时，英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法国。为了埃及，法国和英国差一点儿没打起来。英国和俄国在巴尔干、土耳其海峡、阿富汗、波斯以及中国都有面对面的冲突。大英帝国的璀璨明珠是印度，但俄国恰恰能够扼

住英国通向印度的咽喉。英国和法国、俄国的结盟不是因为绵绵不绝的爱，而是因为旷日持久的恨。1904年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协议实际上是两个国家都感到累了、烦了，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1907年英国和俄国的交好，也是出于羸弱的考虑，英国邀请俄国一起分享世界霸权，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两败俱伤的决斗。

当德国同时对俄国和法国开战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议会陷入了混乱。英国在最后一刻才下定决心参战。从表面上看，英国参战的理由是德国入侵比利时，破坏了1839年欧洲各国签署的《伦敦条约》。这个条约承诺，要保护比利时永久中立。普鲁士也是签字方之一。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如果德国占领比利时，然后又占领了法国，那么就可能从比利时或法国的沿海进攻英国。但这一推测是建立在一系列“如果”的前提下的。假如德国真的打败了法国和俄国，或许会有一天向英国发起挑战，但在1914年，德国两头作战已是应接不暇，怎么可能会想到去打英国呢？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说，英国参战的真实原因是国内政治。以赫伯特·阿斯奎斯为首的自由党政府没能制止这场战争，他和他的内阁成员们本来是应该集体下台的，但参战拯救了自由党。自由党当然害怕改变自己的立场，但他们更害怕保守党上台。当战争刚刚爆发，人们都兴高采烈。欧洲人早已习惯了战争，战争将带来新的生机。人人都觉得自己很快就能赢得这场战争。威廉二世对即将出征的将士们说，到秋天叶落，大家就能回家。俄国将领满心希望在6周之内打到柏林。如果有谁说6个月，大家就会觉得他太悲观了。只有英国名将基钦纳（Horatio Herbrt Kitchener）说，这场战争至少要打三年。大家都觉得他简直是莫名其妙。然而，到1914年11月，西线就已经进入胶着状态，双方的士兵只能躲在战壕里，只能困守，无法进攻。“一战”时期最重要的新武器机枪其实是一种防守型的武器，而不是进攻型的武器。只要战壕加上铁丝网，同时在战壕前面清理出一片开阔地带，就根本不用担心敌人的进攻，就像一个德国机枪手回忆的那样：“敌人几百人几百人地往前冲，我们根本不用瞄准，直接照着人群扫射就行。”1916年7月1日的索姆河会战仅仅在一天时间内，就有两万多名英国士兵惨死在德国的机枪下。“一战”夺去1000多万士兵的生命，2000多万士兵负伤，欧洲几乎十室九空。

著名军事史学家约翰·基根（John Keegan）说：“‘一战’是一场不必要的悲剧。”斐迪南大公遇刺并非“一战”爆发的真正原因。“一战”的背后也没有不可告

人的阴谋。短视和贪婪、自私加懦弱、平庸与激情，所有要素糅合起来，突然产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在最晴朗的艳阳天，陡然来了一场暴风雨。

克拉克在书中说道，皇帝、外交官、将军都懵懵懂懂、莽撞自负、懦弱多变，犹如一群梦游者，最终使整个欧洲卷入史无前例的浩劫。当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时，塞尔维亚总理帕希奇还在外地参加竞选活动。听到这一消息，他想到的不是在第一时间回去商量对策，而是想能不能化名到国外度假。在转折点上，历史确实是由少数人决定的，但他们远远谈不上是英雄人物，他们可能只是一群缺乏智慧和胆识，既没有责任心，又没有牺牲精神，只是出于巧合和偶然被放在舞台中央的平庸者。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前言

1914年6月28日是个星期日。这天清晨，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偕夫人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抵达萨拉热窝火车站时，欧洲大陆还是一派和平的景象。然而，37天之后，这里却燃起了战火。这个多事之夏爆发的冲突导致欧洲成为6500万兵力厮杀的战场，三大帝国卷入其中，造成1000多万士兵和平民死亡，2000多万人受伤。这场浩劫宣告了降临在20世纪欧洲的恐怖的开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所说，它是“20世纪所有灾难的开始，此后各种灾难便接踵而至了”。战争爆发之前，人们就开始对战争为何会发生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时至今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也未有定论。这一事件还催生了数量空前、内容翔实、流露出强烈道德情感的历史文学作品。此外，1914年发生的事情仍是那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政治危机，由于它们过于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的假设和猜想都能够自圆其说。

研究“一战”起源的历史学家总会碰到一些问题。首当其冲且最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资料的过剩。每个交战国都有卷帙浩繁的官方外交文件，搜集的档案资料也数量庞大，而其中有些文件是否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还有待商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布的官方文件大都带有致歉并反思的意味。长达57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Die Grosse Politik*）将15889份文件归纳在300个主题下，但它本质上并不具备纯粹的学术客观性，人们只是希望能够通过曝光战前的档案来反驳《凡

尔赛条约》( *Treaty of Versailles* ) 加之的“战争罪名”。法国政府也不例外。外交部长让·路易·巴尔都( Jean Louis Barthou ) 于1934年5月指出, 战后出版的文献“充满浓厚的政治色彩”。其目的在于“根据《凡尔赛条约》, 在德国发起的这场战争中维持秩序”。1926年出版的8卷合集《奥匈帝国外交政策》( *Ö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 ) 的其中一位编者路德维希·比特纳( Ludwig Bittner ) 在维也纳指出, 他们之所以出版该合集, 是未雨绸缪, 及时出版官方资料, 防止某些国际机构( 很有可能是指国际联盟 ) 迫使奥地利政府在情况并不乐观时出版。抱着将法国要求赔付战前贷款这一事实合法化的希望, 苏联早期的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旨在证明: 是独裁的沙皇及其盟友挑起了战争。在英国, 人们高调呼吁学术公正, 《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 也应运而生。尽管如此, 之后的文件记录仍有偏颇和疏忽, 这也使得关于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英国的所作所为的描述并不中肯。总而言之, 尽管有着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 但正如德国军事历史学家伯恩哈德·施韦特费格( Bernhard Schwertfeger ) 在其1929年的批判研究中所言, 欧洲的文件记录俨然在为“历史文件领域的世界大战”提供军火。

对于那些致力于洞悉通往战争之路的人来说, 尽管政客、指挥官以及其他关键决策者的回忆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但它们同样疑点重重。对于人们热切关注的问题, 很多文件却保持出奇的缄默。在此举三个例子: 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 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 ) 于1919年出版了《对世界大战的反省》( *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 ), 实质上对他自己及其同僚在1914年“七月危机”时的行动只字未提; 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 Sergei Sazonov ) 在其回忆录中对自己在关键事件中的表现轻描淡写、敷衍了事, 丝毫没有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 Raymond Poincaré ) 的10卷回忆录记录了他的执政时期, 但它的宣传作用却超过了其启发性——普恩加莱关于危机时期的“回忆”与他当时匆匆记下的日记( 这些日记并未出版 ) 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 Sir Edward Grey ) 那言辞温和的回忆录也只是隔靴搔痒地解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 他在1914年8月之前对协约国的承诺以及这些承诺在他处理危机时所起的作用。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伯纳多特·埃弗利·施米特( Bernadotte Everly

Schmitt)的历史学家曾于20世纪20年代末造访欧洲,并采访了一些经历过战事的政治家。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受访者对自己的作为从未感到怀疑(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格雷,他“直率地承认”,在“七月危机”发生时,在通过柏林与维也纳协商的过程中,他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但他提到的这个错误并不重要,同时这种口吻也折射出一种英国特有的自我贬低的官方话语方式,因此这并不是对其负责任的认真反省)。其他人的回忆同样漏洞百出。施米特追踪访问了俄国前财政大臣彼得·巴克(Peter Bark),他现在是伦敦的一名银行家。1914年,巴克参与了一系列会谈,会议上做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决定。然而当施米特与他对话时,巴克却坚持说他“不记得那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了”。幸运的是,这位前大臣当时的笔记给我们提供了更真实的信息。1937年秋,一位名叫卢西亚诺·马格里尼(Luciano Magrini)的研究者来到贝尔格莱德,对每一位与萨拉热窝阴谋有关系的幸存者进行了采访。他发现,有些人对一些他们并不知道的事情作证,有些人“保持沉默,或对他们所知的事情给出错误的解释”,还有一些人“夸大事实或是一味专注于自我辩解”。

此外,我们现有的了解仍旧匮乏。许多与关键人物的交流只是口头进行的,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它们都是通过间接的或者后来的证据来重现历史的。与萨拉热窝事件相关的塞尔维亚的组织异常警惕,并没有留下书面证据。涉嫌参与刺杀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关键人物——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主管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定期焚毁他的文件。很多人对维也纳和柏林在最早关于如何应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讨论的确切内容一无所知。记录6月20~23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俄法首脑会议的文献对理解危机的最后阶段具有潜在的巨大重要性,然而它们却无迹可寻[俄国的会议记录可能早已丢失,而委托编辑《法国外交文件》(*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的团队也没能找到法方的版本]。苏联曾经的确出版过许多关键的外交文件,以此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阴谋,但这些文件对时间段的划分并不规范,没有按照一定的顺序编纂;此外它们还普遍存在片面聚焦某些事件的问题,比如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有些文件(其数量不明)在内战时期混乱的运输过程中丢失,苏联也从未有系统编纂成卷的可与英国、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原版相匹敌的文档记录。时至今日,俄方出版的记录仍然处于未“竣工”的状态。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一战”危机内幕的繁杂精细。古巴导弹危机虽然已经足够复杂了，但它所涉及的仅有两大阵营而已（美国和苏联），无非再加上那些“代理者”和“追随者”。与此相反，要研究“一战”的起因，必须要弄清楚实力居于同等地位、相互独立的5大竞争对手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它们是德国、奥匈帝国、法国、俄国和英国，如果我们加上意大利的话，这一数字就变成了6个；此外，其他一系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且拥有独立主权的方面同样可以考虑在列，如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诸国——后者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内政治局势高度紧张且动荡不安。

参与战争的国家政策制定过程往往并不透明，这是研究“一战”起源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1914年的“七月危机”表现出“国际化”特征，它波及一大批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联系紧密，又是独立而离散的单一实体——就像台球桌上的台球。但是危机期间负责政策制定的权力机构却并不统一。在多个执行单位中，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究竟谁是真正的政策制定者；此外，那些所谓“政策”（或至少是那些影响政策走向的不同的主观意愿）并非必然出自国家的高层系统，它们或许出自外交组织的外围机构、军事指挥官、部门的官员，抑或来自职权范围常常包括政策制定的大使们。

由此看来，现存的资料中，关于承诺、威胁、计划和预言的内容相互交错，毫无头绪，如此具有迷惑性的卷帙浩繁的解读使得战争爆发的原因变得捉摸不定。实际上，任何观点都能够在现有的资料中找到证据支持。正是因为关于“一战”起源的解读囊括了太多的维度，因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甚至一位能够驾驭多国语言的出色学者）历尽一生都无法阅尽它们——根据20年前的统计，当时就已经有2.5万份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了。其中一些将战争责任归罪于某个充当“害群之马”的国家（公认的是德国，但实际上其他国家都难辞其咎），另一些将原因聚焦于“体制”的缺陷。总之，问题的复杂性并没有终止人们的讨论。历史学家试图解开战争罪责或是独立机构和体制约束之间关系的问题，他们的辩论又延伸到对国际关系全局把握的宏观视野上，其中包括关系中的威慑、缓与与疏忽，或是诸如平衡多方、协商和顺应时局的普适机制。尽管这些辩论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但仍然没能找到突破口。

尽管人们对这些辩论已不陌生，但这一主题却历久弥新。实际上，与二三十年



前相比，它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时代和世界的改变让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 1914 年。20 世纪 60~80 年代，人们越发普遍认为 1914 年爆发的战事散发着神奇的魅力，并很容易将欧洲“最后的夏天”那场灾难想象成爱德华时期的一场古装剧。在现代人的头脑中，那个仍然以世袭皇权为统治的世界，那个追求奢华的年代中苍白的礼节和华而不实的服饰已经离去，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似乎来自另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这些设想在潜意识中坚信，如果这些主人公的帽子上插着俗丽的鸵鸟毛，那么他们的思想和动机也一定是如此滑稽且荒唐的。

然而对于一位了解 1914 年“七月危机”爆发始末、身处 21 世纪的读者来说，他会危机中展现出的原始的现代性感到震惊。事件以车队和自杀式袭击开场。在萨拉热窝事件背后，分明是一个崇尚献身、死亡和复仇的恐怖组织，但是这一恐怖组织并没有固定的活动区域，没有明确的地理或政治归属，它只是分散在政治边界的小股势力，人们无法对其做出界定，因为它只是间接与其他政权相联系，想要从组织外围觉察出其隐秘的存在是相当困难的。诚然，人们还是完全有理由认为 1914 年 7 月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它呈现出更清晰的轮廓。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两极化的体系日益明显，各种力量前途未卜，帝国走向衰落，新兴大国正在崛起——与 1914 年 7 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视角的转换让我们重新反思战争是如何在 1914 年降临到欧洲的。接受这项挑战并不意味着对流于俗套的现代主义的默许（这种现代主义将历史的解读建立在满足现代需要的基础上），而是利用现代的优势去认可过去以及历史中的人物。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战争的开端，即巴尔干地区的背景。塞尔维亚是关于“七月危机”的史籍中的盲点之一。很多人将萨拉热窝事件仅仅当作一个托词，与最终发起战争的真正列强相比，它实际上无足轻重。近期对于 1914 年战争爆发的一个精彩的解释提到：“（萨拉热窝）行刺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真正让这些国家走向战争的是人们对这次事件的利用。”“七月危机”中，从宏观的巴尔干地区的维度来看，对塞尔维亚的边缘化引燃了事件，成为萨拉热窝事件的导火线，并一发不可收拾，进入地缘政治阶段；随着事态的发展，塞尔维亚的重要性也逐渐被淡化。

其次，我们的道德罗盘同样发生了偏转。以战胜国姿态出现的塞尔维亚族居于主体的南斯拉夫，似乎隐晦地为 1914 年 6 月 28 日那位打响第一枪的人做出了合